

前 言

远古时候，今天的杭州城区和西湖，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浅海湾。西湖南北的峥嵘群山，那时惟有峰顶露出水面，其余大部分埋在海底。北面的北高峰、龙和山和南面的凤凰山、吴山等向东突出，成为大海中的两个海岬，湾底靠飞来、南北诸峰，整个海湾呈马蹄形。杭州蛰居江流海潮交汇之地，是钱塘江流域的天然吐纳港。今天的杭州湾两岸陆地，大多由钱塘江带下海潮涌上的泥沙久经堆积而成。考察秦汉时期的今江干一带，尚卧海底，南岸的西兴镇则逼临江浒，水面辽阔。

从大禹治水的夏朝到春秋时期，杭州是越国的故地。战国时越国为楚国所灭，杭州又纳入楚国的版图。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把全国划分为36郡，以后又增至40郡。在吴、越故地设置了会稽郡，会稽郡下辖26县，地处武林山麓的钱唐县就是其中的一个。钱唐就是杭州的前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游经过丹阳，至钱塘（今杭州），钱塘地名便肇端史册，迄今已2217年。

杭州摆脱其山中小县而跃居大都市，应归功于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的迁治。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改钱唐郡为杭州并移治余杭。第二年，迁回钱唐。

杭州城市的发展，从宋室南渡达到登峰造极境地。建炎

三年（公元1129年），宋高宗从扬州渡江杭州，旋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临安，于是东南第一州更鳌居为南宋全国第一州。12世纪的世界各国当以南宋最为繁荣富盛，杭州当之无愧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马可波罗在南宋灭亡后畅游杭州，仍称“天城”，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同样，杭州医药事业源远流长，中药资源丰富，药用植物良多，名医辈出，本草著作叠出。鸦片战争后，西药传入，市内西药房相继出现，生产、出售西药。因此，撰写一部自古迄1949年的杭州医药发展史，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意义重大。虽然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已销售含有杭州医药发展内容的志书和著作，诸如浙江省医药志编纂委员会的《浙江省医药志》、杭州医药商业志编纂委员会的《杭州医药商业志》、张承烈教授的《钱塘医派》、朱德明教授的《浙江医药史》、《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元明清时期浙江医药的变迁》及《近代浙江医药的沉浮》等，但迄今为止没有关于杭州医药发展这方面的专著付梓，实为憾事。我们捷足先登，抛砖引玉，撰成这本拙著，呈给读者。其实，杭州医药学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落后到先进的中华民族地方医药创业史。

众所周知，中国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传统医学中一枝独秀的奇葩，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医药学源远流长，有数千年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有完整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和蕴藏在

广大群众之中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医疗技巧。以天然动、植物为主要来源的中药，没有以化学合成为主要来源的西药那样多而严重的毒副作用。中医的治疗无须昂贵的医药与检查费用，中医学的整体观、恒动观、对立统一观、动态平衡观、正邪观、脏腑经络系统论、辨证诊治等基本思想，永远闪烁着新方法的光辉，中医学已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学学历数千年而不衰，始终一贯地沿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的途径向前行进，显示出了自身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在西方医学昌明于世界，盛行于中国，世界各地如埃及、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传统医学都相继在竞争中败落的今天，中医学却经久不凋，兀然独立，竞秀于当今世界，坚持自己的学术体系，在理论上保持自身优势和特点，在临床实践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疗效。中医学创造性地发展了一整套理法方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有着巨大贡献。

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江泽民总书记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畅言：“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006年10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向，充分肯定了中医学，亦是本书的原始动因。当然，对这一城市（地域范围含钱塘县、仁和县）医药发展（自古迄1949年）的系统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领悟杭州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发展史上的地位，使人们获得彰前察来的启迪。同时，该课题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杭州市旅游局、文化局、文物管理局以及杭州市

园林管理局药膳一条街的医药文化古迹的整治开发，使杭州面向世界，并有着较大的旅游经济价值和文化兴市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史学界定 1840 ~ 1919 年为中国近代时期，1919 ~ 1949 年为中国现代时期。我们为写作方便却把清朝划为两个时期，即初期（1636 ~ 1839 年）和后期（1840 ~ 1911 年），我们将把在清朝初、后期发生的医药事件和医林人物按此归类。少数医林人物出生年月较难考证或从医家学派沿革考虑，归类差错敬请鉴谅。

本书除前言外，共分十二章：第一章杭州城市的形成及医药发展的地域时代背景。第二章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医疗机构。第三章医家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第四章医药学家及其医著。第五章医学教育、学术团体及医学期刊。第六章临床医学的发展。第七章慈善医药事业。第八章药学的发展。第九章环境卫生的治理及疫病的流行。第十章宗教与医药学。第十一章民间医药习俗。第十二章杭州与国外的医药交流。

本书各章内容的研究明显具有不成熟性，尤其在临床医学的探讨方面较为粗浅，错误纰缪或意彰未逮者恐难免，期待学术界同仁雅正。

朱德明

2007 年 3 月 28 日于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目 录

第一章 杭州城市的形成及医药发展的地域时代背景	(1)
第二章 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医疗机构	(13)
第一节 古代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医疗机构的创设	(13)
第二节 近现代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医疗机构的设置	(21)
一、浙江省卫生处、杭州市卫生局、热带病研究所的建立	(21)
二、西医医院和诊所的建立	(26)
三、中医医院和诊所的发展	(30)
第三章 医家学派及其学术思想	(34)
第一节 丹溪学派的渊源	(34)
第二节 钱塘医派的概况	(36)
一、医派形成的学科背景	(36)
二、医派嬗递	(39)
三、治学特色	(48)
四、学术思想	(52)
五、主要成就	(55)
六、历史贡献	(75)

第四章 医药学家及其医著	(83)
第一节 古代医药学家及其医著	(83)
一、元朝以前医药学家及其医著	(83)
二、元明时期医药学家及其医著	(101)
三、清朝初期医药学家及其医著	(114)
第二节 近现代医药学家及其医著	(129)
一、清朝后期杭州医药学家及其医著	(130)
二、民国时期杭州医药学家及其医著	(137)
第五章 医学教育、学术团体及医学期刊	(143)
第一节 医学教育	(143)
一、中医教育	(143)
二、西医教育	(158)
第二节 学术团体及医刊	(173)
一、中医药学术团体及医刊	(173)
二、西医药学术团体及医刊	(183)
第六章 临床医学的发展	(188)
第一节 临床医学	(188)
第二节 食疗及养生保健	(193)
第七章 慈善医药事业	(201)
第一节 育婴堂	(201)
第二节 养济院	(204)
第三节 瘞 葬	(208)
第八章 药学的发展	(212)
第一节 古代药业	(212)

一、药材丰富	(214)
二、药业行会、药市、店堂鳞次栉比	(229)
三、制药工场、器皿	(252)
第二节 近现代药业	(257)
一、中医药业行会、药材及药行	(257)
二、中药厂店	(264)
三、中药生产	(292)
四、人参、制胶行业	(300)
五、西药房及西药行会	(309)
六、西药及医疗器械生产	(325)
第九章 环境卫生的治理及疫病的流行	(349)
第一节 环境卫生的治理	(349)
一、环境卫生	(349)
二、食品卫生	(350)
三、饮水卫生	(350)
四、学校卫生	(354)
五、健康教育	(354)
第二节 疫病的流行	(355)
第十章 宗教与医药学	(360)
第一节 儒学与医药学的关系	(360)
第二节 佛教医药学	(362)
一、寺院医药	(363)
二、僧侣医师	(365)
三、寺院药材	(367)
四、中外佛教医药交流	(367)

第三节	道教、景教医药学	(369)
第十一章	民间医药习俗	(377)
第一节	沐浴及节日医药习俗	(377)
第二节	节日医药习俗	(378)
第十二章	杭州与国外的医药交流	(382)
第一节	杭州医药学的传出	(382)
第二节	国外医药学的传入	(389)
附录一	历朝杭州籍医家医药著作简目	(394)
附录二	杭州医药大事记	(398)
后 记	(404)

第一章 杭州城市的形成及医药发展的地域时代背景

杭州蜚居江流海潮交汇之地，是钱塘江流域的天然吐纳港，夹身两浙间，是自北徂南的天然渡口，极益都市发展。今天的杭州湾两岸陆地，大多由钱塘江带下海潮涌上的泥沙久经堆积而成。古代，西湖实是湾里的一个小海湾，西湖以东的平陆被波涛湮没。考察秦汉时期的今江干一带，尚卧海底，南岸的西兴镇则逼临江浒，水面辽阔。

远古时候，今天的杭州城区和西湖，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浅海湾，西湖南北的峥嵘群山，那时惟有峰顶露出水面，其余大部分埋在海底。北面的北高峰、龙和山和南面的凤凰山、吴山等向东突出，成为大海中的两个海岬，湾底靠飞来、南北诸峰，整个海湾呈马蹄形。

大约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今杭州城的西北一带已有原始人类活动。从考古发掘得知，从今西湖北首的老和山麓，经过古荡、勾庄、水田畈，向西北延伸到余杭的良渚、瓶窑、安溪等处，都发现有原始人类生活的遗址与遗物，考古学上通称“良渚文化”。

老和山遗址，是距杭州旧城最近的一个原始聚落，距西湖仅1 500米。1953年营建浙江大学新校舍时，在山麓发掘出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有石器、玉器、陶器等残片2 000多斤，其中有龙石斧、石刀、石凿、石箭头、石网

坠、石砂轮、石针以及玉器等。老和山高约200米，是天目山的余脉，附近山冈蜿蜒，溪沟纵横，依山临水，成为杭州旧城区最早的原始聚落。

水田畝遗址，位于今半山车站的南面。附近土质松软，河渠密布，适宜耕稼。这里的出土文物丰富多彩，有犁、砬、斧、刀等石质农具和大量水稻、芝麻等农作物的种子，这是已经过渡到农业经济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证据。在遗址的水沟里还发现了4个木桨，其中有宽翼木桨1件和狭翼木桨3件，长约2米，说明这里业已广泛使用独木舟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另外发现有石网坠与穿有三孔的鱼网板浮标，可见渔猎也成为生活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不少木榔头、木盆、竹编物等日常生活用具。从遗址推断，当时人们已开始构建房屋。这些房屋面积虽然狭小，但和中原地区的半穴居住房不同，适应于地势低洼的南方。水田畝文化层已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全国分为九州，杭州属于古扬州。古扬州与今扬州不同，是泛指长江以南江水波扬的广大水乡。从大禹治水的夏代到春秋时期，杭州是越国的故地。战国时越国为楚国所灭，杭州又纳入楚国的版图^[1]。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把全国划分为36郡，以后又增至40郡。在吴、越故地设置了会稽郡，会稽郡下辖26县，地处武林山麓的钱唐县（今杭州）就是其中的一个。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游经过丹阳，圣迹钱唐，钱唐地名便肇端史册，迄今已2216年^[2]。

西汉，钱唐仍属会稽郡，但它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117年）还把会稽郡的西部都

尉（即负责郡级治安的军事机关）的治所设在钱唐的武林山。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改制时，又把钱唐改为“泉亭”。东汉建立后，汉光帝又恢复钱唐旧名。

东汉顺帝时，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与钱塘江航运的兴起，开始以江为界，把会稽郡一分为二，在江北增设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江南仍属会稽。钱唐县从此划归吴郡。钱唐故县的范围大致是：南至五云山的江边徐、范村（即梵村），西北至粟山石人岭和西溪，东到宝石山麓的大佛寺附近。这一带环绕着灵隐、天竺等南北诸峰（汉时通称为武林山），数千户人家散居其间，是个山中小县。

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的狂飙冲击下土崩瓦解。富阳人孙坚在军阀混战中逐步壮大起来，其子孙权在229年自称皇帝，建立吴国，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曲折多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饱受战乱蹂躏的北方人民纷纷南迁，部分蛰居杭州一隅，增加了杭州地区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为当地进一步开发提供了良机，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一度可与北方发达地区相媲美，医药卫生的嬗递亦是如此。无怪乎南朝刘宋文帝说：“天下五绝而皆出钱塘。”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地处江左的钱唐县发展得更快，成为钱塘江下游的重要县城。

南朝萧梁（公元503~557年）时又将钱唐县升为临江郡，到陈朝（公元558~589年），又改临江郡为钱唐郡。从此，钱唐县就成为郡治所在地，县的范围也沿钱塘江扩展至凤凰山麓的江干一带。

杭州摆脱其山中小县而跃居大都市，应归功于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的迁治。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隋朝废除钱唐郡，设置杭州，钱唐成了杭州的属县。杭

州之名从此出现于史书。第二年，州治从余杭迁至钱唐，又把原来的新城（今浙江富阳县新登镇）、海盐也并入钱唐，扩大了县境。591年，州县移治柳浦西（今城东南的贴沙河），河上跨浦桥，桥南婷立浙江亭，是驿路必经之地。晋宋以降，柳浦一带已一望平陆，宋后遂为津渡要地。经南朝岁月生聚，日渐蕃息。隋因移州于此，在浦西凤凰山麓大兴土木，夯建新城。自此，偏僻的钱唐县名声远扬。

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中国大地版图上出现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这条大河的南端正是钱塘，绵延800多里。江南运河是隋炀帝所开大运河的最南段，杭州与全国各地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城市地位日见重要。大运河的通航，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杭州的发展与都市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此，杭州成为大都会的基础已经夯实，从此拉开了钱塘繁荣的序幕。隋朝统治时间虽短，但对杭州市正式成为一个城市，却起了奠基作用。

钱塘在唐之前一直被称“钱唐”，因避唐朝国号之讳，才在“唐”左边加了“土”，钱塘之称一直沿用至今。由于隋末战乱很少殃及杭州，致使唐朝时期杭州经济突飞猛进：兴修杭州西湖等较大水利工程多处，人口迅速增长，杭州成了江南繁华的城市。

唐朝三百年间，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建设，都市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如唐朝少府监（主管手工业的中央机构）把全国的绢布按质量好坏分为九等，杭州所产的苧（苧麻织成的粗布）列为第四。杭州所产的绫，还受到大诗人白居易的称赞，他在《杭州春望》一诗中，有“红袖织绫夸柿蒂”之句，就是称誉杭州女工织造的有柿蒂花纹的绫。此外，杭州造船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民间已能自造三丈长的

大船，船体规模和工艺水平，均和当时著名造船业中心的苏州、扬州不相上下。店肆达30 000多家，每年商税收入达5 000万缗，约占全国商税收入的百分之四。

当时杭州的兴盛，还表现在城区的扩大上。唐朝时城区从原来的城南江干一带向北延伸到武林门。城南江干成为海外贸易的码头，城北武林门一带，则因大运河的通航而成为附近州县货物的集散地。城区人口也迅速增加，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达到86 000多户。杭州在晚唐之时，已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东南名郡。

唐朝的杭州，下辖钱塘、盐官、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富阳、新城（今新登）8县，州治在钱塘，府署在凤凰山麓的渡口柳浦（今江干区一带）。杭州的繁华起始唐朝，而大唐杭州的克臻繁荣一方面承袭了隋朝的基业，另一方面当朝的建树功不可没。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海上贸易的开辟。有唐一代，国威远振，海外交通盛极一时，广州、扬州、杭州均是重要的通商口岸，贸易红火。

二是解决了市民的引水问题。杭城的陆地既是江海故地，自宋以前，江流东去城郭甚近，地下水潜相通灌，咸苦不能饮用。惟有负山居民，凿井汲取甘泉，范围狭窄，最初人们聚落不在中城、下城的广大平原，而在上城的凤凰山麓。其后因交通便利，商贾辐辏，居民日众，饮水遂成严重的生活问题。唐代宗大历期间（公元766~779年），刺史李泌始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分开6处水口，引导西湖水入城，渚为六井。穆宗长庆期间（公元821~824年），刺史白居易复加开浚，居民淡水充足，生齿日繁，城邑聚落范围突破了南部山麓地带，逐渐北展。南起江股，北届武林

门和艮山门的市区，肇基唐朝，但筑城年代已无从查考，今日杭城大致拓定此时。从唐朝至元朝，杭城南临江干，南北较今城为长，东至东青巷、城头巷，东西较今城为狭，城区呈狭长形。元末张士诚改筑城垣，将荒废的南宋故宫划出城外，把东面的新市区划入城内，形成随后的城区。

三是农田水利的兴建。杭州夏秋期间易旱，对农业影响很大。西湖居浙西平原的上游，唐以前未能利用这一天然水库。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筑堤捍湖，以时蓄泄，杭州东北濒河的1000多顷农田，都得到灌溉，年年喜获丰收。

四是西湖风景的扬名。西湖妙境天成，冠绝宇内，但唐朝以前很少有人题咏，知者殆鲜。长庆年间，白居易守杭，酷爱湖山，眈昵云树，新词艳曲，层出不穷，绘尽西湖美景。当时，白居易诗名震撼一世，西湖经其品题，闻名遐迩，云集了四方文士。北宋熙宁、元祐年间，著名诗人苏轼又两任杭州，留下了丰硕的西湖诗篇，逾越乐天。人们认为“杭州巨美，自白、苏而益彰”，洵属知言。使杭州从小城市跃居为大都市的功臣当推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北宋时杭州被誉为“东南第一州”。

因此，杭州从隋唐到五代十国时期的科技文化发展经久不衰，医药卫生的发展亦步亦趋，这主要表现在设置了医药学官员，加强了医药行业的管理，而且，杭州朝贡的中草药品种之多居全国前茅，木、石、陶、瓷质医药卫生用具琳琅满目，综合治理饮水卫生的工作颇具成效。另外，杭州与日本的医药学交流也较为频繁。

909年，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朱温废黜唐朝末代皇帝，改国号为“梁”，统治黄河流域，史称“后梁”。此后，在南

方以及山西等地，军阀乘机崛起，相继建立了10个割据政权。钱镠建立的吴越国，便是十国之一。吴越国地分十三州一军，定都杭州，加名西府，或称西都。这是杭州作为封建帝王之都的开始，在杭州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杭州真正名声鹊起则在五代十国时期，乱世枭雄钱镠建立了吴越王朝，并将钱塘升格为国都。《玉照新志》记载：“杭州在唐，繁荣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钱王独霸一方，却能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保境安民，繁荣经济。使钱塘不仅躲开了战火的涂炭，而且伺机发展成东南第一繁华城市。

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在杭州设置“织务”，专门管理并收购绢达25万匹，占浙西七州三分之一强。同时，雕刻印刷也居全国首位。此外，酿酒、造船、制扇等手工业都很发达。

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设立市舶司，杭州成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

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梅挚出任杭州知府，宋仁宗赠诗示宠，称赞杭州是“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可见北宋时期的杭州，已经成为东南沿海的大城市。

北宋前期，杭州人口增加了一倍。据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的《九域志》载，彼时杭州人口已达202800多户，成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五代至北宋前期，杭州已成为“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的大都会。杭州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学术和文艺都居全国前茅，达到高度昌盛时期。杭州丰富的药源为治病救人提供了保障，并推动了制销药品业的发展。北宋末年，杭州设立了医学官制和惠民药局，掌管药物，为民治病，还出

现了杭州第一所亦是当时中国为民服务的最大医院“安乐坊”。

杭州城市的发展，从宋室南渡达到登峰造极境地。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宋高宗从扬州渡江到杭州，旋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临安（今杭州），于是东南第一州更鳌居为南宋全国第一州。南宋时期，临安府城多次扩建，成为南跨吴山，北到武林门，左靠钱塘江，右近西湖的大城，气势宏伟。四周开了13座城门，城墙高达3丈，厚约丈余，禁约严厉，人不敢登。城墙外围有10多丈宽的护城河，护城河两岸种植杨柳，禁止行人往来。至南宋末，杭州“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其市区大致东南尽江涛，西南起龙山（六和塔下），西际天竺、灵隐，北包西溪、北关，远接安溪、临平。

南宋时期，由于赵宋朝廷偏安杭州，“大驾初驻蹕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3]带动了各业兴盛，使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也使经济起色很大。在商业方面，临安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往来辐辏，非他郡比”，“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店铺多移向街头，临街营业。今官巷口至羊坝头一带，为府城最大的闹市区，金银珠宝商店集中之地，就是今上、下珠宝巷一带。杭州素称“丝绸之府”，丝织业历史悠久。南宋时除继续生产传统产品外，还试制了不少新品种。杭州印刷业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之冠。凤凰山下修内司官窑所产的瓷器，专供皇室使用，极其精致。当时杭州还能精制各种西湖画舫与大舰，造船业相当发达。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南宋的最高学府太学，是以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住宅扩建而成的，故址约在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近。学生多时达2 000~3 000人。一种类似科技的专门大学，如武学、医学和算学等，也应时而生。民间戏艺，更是百花争艳，仅杭城内外出现的固定游艺场有就20多处，当时称为“瓦子”、“瓦舍”或“瓦肆”。海外贸易也十分发达，“四方百货不趾而集”杭州。

南宋都城临安的医药机构相当完备，赓续北宋旧制设置医学官制和惠民药局，管理医药。医学教育颇为完善，著名医药学家辈出，人数之多占居全国首位。药品制销制度较为周全，城内药铺林立，药材丰富，医药用具烧制颇多。城市的环境卫生清洁美观，食品卫生较为讲究，个人卫生习俗比较文明。医药慈善事业也具有相当规模。因此，南宋时期的杭州是全国医药卫生最发达的地区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12世纪的世界各国当以南宋最为繁荣富盛，杭州当之无愧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马可波罗在南宋灭亡后畅游杭州，仍称“天城”，赞其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那时世界第一大都会的荣华浩穰，难以尽言：城区运河浚疏畅通，巨舰通行无阻，砖石铺成的道路雨时并不泥泞。浙右江淮河艘骈集城北，江船海舶蚁集江岸。巨富高资、江商海贾、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街衢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渐稀，五鼓钟鸣，商贩开张。杭州确实可与《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景色相媲美。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79年），元朝灭宋，改临安为杭州路，此后80年，政治上杭州退为东南第一州，经济上仍雄据全国乃至世界第一大都市。杭州的丝织业、印刷